

■新作聚焦 朱秀海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

为革命圣女塑像

□贺绍俊

读完《远去的白马》,就觉得心中升腾起一个神圣的光环。

小说中的赵秀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胶东姑娘,还是少女青涩时期就在抗日烽火的熏陶中成长为一名智勇多谋的村长,后来又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支前队长。她阴差阳错地跟随东北野战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同战士们一同出生入死,历经艰辛,发挥着常人难以起到的作用,为解放大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赵秀英是朱秀海塑造的又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似曾相识,却又令人耳目一新。说她似曾相识,是因为她就在中国革命英雄谱系的序列之中,她的聪明智慧、她的人民本色,她对革命的忠诚、对爱情的执著等等,或许也能在过去的文学经典人物身上有所发现。但她绝对又是耳目一新的,因为她集全部的完美于一身,在她身上闪耀着崭新的光芒。这种光芒我愿意称之为“神圣性”。神圣,是赵秀英最为打动我的地方。在她的心目中,革命是神圣的。她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所做的一切是神圣的,一直萦绕在她心上的爱情梦也是神圣的。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很多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但是还没有一个像赵秀英这样闪耀着神圣性光芒的革命者形象。这是朱秀海最值得称道的创造。

我联想起西方文化中的圣女贞德。她是法国的一位乡村少女,称自己在大树下遇见天使,获取上主的启示,于是带兵出征,收复了被英格兰人占领的法国失地,成为法国人崇拜的女英雄,其后又被教会封为圣人。圣女贞德从此相继出现在莎士比亚、伏尔泰、席勒等作家的笔下,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相比于圣女贞德的故事,朱秀海讲述的赵秀英的故事毫不逊色。赵秀英也是一位乡村少女,所不同的是,她不是接受上主的启示,而是受到革命的启示。赵秀英的行为证明,革命同样具有一种神圣的精神感召力,这就是中国的革命斗争为什么会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革命的精神感召力让赵秀英焕然一新,或者说,革命的精神感召力极大地激活了赵秀英的人性美好一面,她以自己的善良、奉献和忠诚充分彰显了革命的神圣性。所以我要说,赵秀英是一位革命圣女。

革命圣女赵秀英首先体现了革命之

神圣。赵秀英是一个孤女,她早年跟随父母逃荒来到赵家坞,父母去世后她是在村民们的帮扶下长大的,革命给她带来了一片新天地,她也全身心地拥抱革命。在朱秀海的笔下,她仿佛就是革命的化身,无论是枪林弹雨下,还是惊涛骇浪中,她完全没有生死的畏惧,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在平度东门外的一场战役中,三营在敌方的强大火力下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时,是赵秀英带着支前队从左翼一下子冲进了战场,马上给战斗带来了转机。当战士们杀进城门洞时,他们看到正在为刚刚负伤倒下的战士包扎的赵秀英,朱秀海写道:“也就是那么一眼,随即全营就一鼓作气冲进了平度城”,在战士们眼里,这位低头认真做事的赵秀英不是一位圣女的形象吗?只有圣女身上才会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小说多次描写到这种场景,特别是在三十七团,从团长到普通战士,个个都佩服赵秀英。其次,革命圣女赵秀英之神圣还体现在她对信念的执著和理解上。赵秀英在东北战场上光照夺目,功赫显著。革命胜利后,她的人生命运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她不再被众人簇拥着、赞美着,而是遭到人们的指责、怀疑。这时候,她选择带着儿子来到深山里,侍候一位烈士的母亲。她的生活变得特别艰难,也得不到革命组织的关照,一定程度上说,她与革命失去了联系。但是,尽管她仿佛被浓浓的阴霾笼罩着,内心却依然充满阳光。她丝毫没有怨恨和委屈,仍然像过去在激烈的战场上一样,低头认真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因为神圣的信念将她的内心照亮,更因为她对信念的深刻理解使得她的内心很平静。赵秀英对信念的深刻理解突出体现在一次与千秋的对话中,她说:“千秋,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活下来的也要承担一些代价。”“革命胜利后,也仍然要有人为革命承担代价。”她说她想明白了这个理儿,所以就不想再埋怨谁,也不想自己吃亏的事了。可是,在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把这个理儿想明白呢?赵秀英想明白了,她当然就是革命的圣女!

朱秀海显然也被革命圣女赵秀英所感动,也对革命的神圣性同样怀着景仰之情,因此他用美好、干净和端庄的文字来讲述赵秀英的故事。最能体现朱秀海在



艺术上对赵秀英的精心刻画,是他特别拎出白马的意象来与赵秀英相伴。白马,无论在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一个美好的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首先想到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白马王子。白马王子是童话故事里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将落难的少女拯救出来。如今,白马王子成为了青春少女的浪漫情结,是姑娘对理想情侣的美好想象。赵秀英的新婚具有非常鲜明的革命年代的特征,她的婚姻是由组织指派的。这看似违反了恋爱自由的原则,但在当年战争年代的残酷环境中又具有合理性,朱秀海不仅写出了其合理性,也写出其人性温暖的一面。赵秀英期盼新婚之夜能等来自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她的白马王子是在一次夜袭炮楼的战斗中一起合作过的骑着白马的营长。她希望组织派来的新郎就是这位白马营长。虽然发生了阴差阳错的事情,但赵秀英最后还是等来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朱秀海以充满诗意的文字详细描述了赵秀英在新婚之夜的心理活动,将一个纯洁少女与她的浪漫情怀定格在读者心中。白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更丰富的寓意。它寄托着男人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象征着优雅华贵的气质,也抒发自由潇洒的胸襟。朱秀海巧妙地将曹植、李白、徐悱、鲍照以及沈约等多位古代诗

人分别写的《白马篇》直接移入小说情节之中,非常契合赵秀英内心的神圣性。赵秀英所爱慕的男子,无论是英勇善战的刘抗敌,还是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欧阳政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白马。白马在这里显然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一个男人的远大志向。白马同时也是超凡脱俗的形象,它有着优雅的姿态,“连翘西北驰”(曹植《白马篇》),惟有这样,它才会与革命圣女赵秀英心心相印。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白马这一意象也许会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而变得越来越鲜明,它确定性地指向革命事业,指向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指向做一个高尚的人。可以说,白马始终暗喻着赵秀英的神圣性,在赵秀英的心里,永远有一匹奔腾的白马。

朱秀海将小说标题定为“远去的白马”,这或许暗含着他的某种忧伤。因为小说也写到了当下现实的丑陋一面,写到那些只认钱和只图个人利益的人所做出的龌龊的事情,革命的神圣性在这些人心荡然无存。但是,朱秀海不止是忧伤,他还以浩荡之气书写了“永远的白马”。永远的白马就是革命圣女赵秀英。这也就是小说为什么结尾要结在白马上,因为朱秀海相信,白马是永远的,革命的神圣性是永远的,革命圣女也是永远的。

■创作谈

在今天,关于20世纪初中国为什么会开始出现一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红色革命,关于共产党在进行这场过程艰难、牺牲惨重、胜利后又经历了长时期的曲折探索、最终还是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革命时的初心,尤其是这场红色革命得以成功的力量源泉何在,一无所有的共产党为什么会赢得中国,在思想界乃至于一般大众的讨论中仍然是很先锋的话题。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日子,不但最早的一批革命者已经作古,就连革命的第二代也进入了渐次凋零的岁月,之所以仍会发生这样的事,原因很简单:新一代,更新的一代,刚刚开始认识这场革命。

我一直对书写这场红色革命的文学前辈充满敬意,他们的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至少他们试图解读这场革命并回答上面那些问题的心是真诚的,他们经历过革命胜利后最初时期的狂欢和以后数十年的冷静深思,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有一点仍然相同,那就是它们都承认红色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除了用一场这样的革命彻底改变中国,中国在这个星球上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

领导这场红色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将这场革命进行到了今天的是人民。有的朋友不承认“人民”的存在,他们说自己只能看到“人”和“民”,没有人民。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革命,哪怕像《远去的白马》中描述的这样一支革命队伍里最不能打的队伍,也马上就能发现“人民”。当你看到他们中的每一个,和他们聊起家常,就会发现他们自然是一个个的“人”或者“民”,而一旦他们组成一支队伍,扛起枪,赶起大车走上战场,“人民”就出现了,“人民的力量”就开始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在历史舞台上清晰地呈现。作为一名革命与战争的参与者,他们和他们作为个体都有只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命运,或幸福或不幸,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人的遭遇”——像肖洛霍夫一篇小说的题目一样——但一旦成了一个整体、一支大军,成了一支历史的力量,他们就成为了那一道足以扫荡任何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在解放全中国的同时也解放了自己。新中国称自己为“人民共和国”有着真切实在的历史内容和含意。“人民”的战斗、人民的牺牲,包括胜利后对信仰的坚守和奋斗,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今天的共和国,这不是虚言,而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做了什么?这涉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它的宗旨和使命,那绝对不是些无时无刻首先想到“我”的人能够理解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走向人民。简而言之,在整个红色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做的只有一件事:牺牲自己,感动人民这个“上帝”。然后也只发生了一件事:人民受到感动,于是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红色革命的胜利就已经确定无疑了。

采访和写作《远去的白马》的过程也是我的心被感动的过程,而感动我的恰恰是那些被共产党当年感动过的人民。无论在胶东老区,还是沂蒙山老根据地,你随便坐在哪一位老英雄或者他们的儿女的炕头上,马上就能听他们说起起家人一样说起当年的罗荣桓司令、徐向前副师长,许世友司令,说出当年乃至之后几十年间这些名将和这个家庭情同骨肉的关心和故事。古人云礼失求诸野,我在长达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听到这样的故事,经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的力量,如今已经不是问题了。

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者读这本书。在描述红色革命历史的文学作品中,《远去的白马》也许只是长江大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是一滴水也能看到太阳。关于初心和使命,关于人民,关于红色革命的力量源泉,乃至于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秘密,也许就藏在这本关于书写人民英雄和人民革命战争历史的小书里面。

题外之言

□朱秀海

■短评

暖人心扉的主题创作

□胡平

温燕霞的《琵琶围》是一部十分温馨的主题创作,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取材独特,构思精致,叙事婉转,读来感人心曲。

琵琶围是座围屋,琵琶形状,坐落在赣南大山深处,围住了村落搬迁后最后留下的12户贫困人家。他们各有各的理由,成为攻坚大局中之“坚”。县上最后派两名工作干部去做他们的工作,于是在两人和12户之间开始了一段缓慢而逐渐深入的交集。请注意,这个情境的设置是相当别致和富有张力的,显示了作者手法的不俗。作品没有着重铺写扶贫工作的规模和投入,而是将情节集中于表达工作干部的善意和暖意,他们是真的为群众好,坦诚相许,用温暖去融化隔膜,以感情去改变现状。而小说的力量正在于指向人心,作者温燕霞借此将文学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

贫困与脱贫不是由简单的经济数字衡量,扶志比扶贫更为复杂和困难。小说结束时,12户人家都走向了富裕,但真正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精神上实现的蜕变,志得意满的状态和挡不住的奔向前景的脚步。前后过程的确需要一部长篇小说慢慢道来,而作者的写作正抓住了扶贫攻坚的核心主题。

作品中的两位工作干部,一男一女,级别不高,家里还缠着一堆麻烦事,但他们还是以大局为重,住进山寨,凭着良知和责任援助了需要帮助的村民。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不能把他人物写活,则是塑造的基础。我们看到,两人都是个性鲜明的,文化馆副馆长何劲华与人交往犹如“隔着厚木桶蒸水,慢热”,文化馆干部金彩凤擅于聊天,与人自来熟,两人都为人公正,凑到一起,成为佳配。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何劲华容易感性用事,有时做出草率决定;金彩凤快人快语,急了也会发飙,间或惹来麻烦。可是正由于如此,两位主人公都使读者感到亲近可信。他们忍辱负重,想尽办法化解一家家贫困户的心结,建立彼此深厚友谊,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



开展种植铁皮石斛、食用菌、香菇、黄豆,发展养鸡、竹编等生产项目,劳苦功高,感动了所有村民。而村民们始终不知,他们为妻子这些耽误了多少自家的事情。何劲华妻子住院开刀,他无暇照顾,儿子又领回一个未婚女友,在卫生间里生出小孩,家里乱成一锅粥,单位里又有同事借他不在顶替了他的位置。金彩凤与丈夫早已离婚,家中上有老下有,她上琵琶围扶贫后,老母生病卧床不起,女儿高考前夕早恋,影响学习,前夫对此不闻不问,而她又无暇顾及。他们也是普通人,遇到难事也可以要求组织帮扶照顾,但两人都觉得不好开口,尽力自己去克服不耽误工作。《琵琶围》没有营造高大上的语境,只是在静观静写呈现在普通人身上的光芒,但在普通读者读来,反而分外沁入心脾。

琵琶围中最难做工作的是石浩财,作者对他的设计也别具一格。这是一个其他同类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角色,他致贫并非出于能力不足或遇到特殊困难。他曾在经商中小有业绩,但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远近闻名的酒鬼和懒鬼,经常家暴妻子,还拿走了二哥哥媳妇的五万块钱金,

致使他夫妻离婚,家庭破裂,二哥的亲事泡汤,兄弟反目,自此变得更加潦倒。这是一个不多见的专意与工作队作对的人物,由于他有文化、想法、心计和社会经验,当他下决心以坚守贫困对抗一切时,几乎没有个人能够说服和改变他。作者将他摆在何劲华们的面前,迫使主人公们使出浑身解数,与之周旋,在改造他的过程中尽显正能量的光泽。这个人物的设置成为全书的一个“眼”,通过他调动起小说中持续不断的戏剧性冲突,而他终于彻底心悦诚服于工作干部,洗心革面于未来,并开始发挥自己的能量造福于集体事业时,作品便自然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也显露出扶贫题材创作能够达到的新深度,属于温燕霞所揭示的深度。

小说利用赣南革命传统背景,穿插进哑巴、橘子婆等苏区老人的故事,使现实扶贫工作与当年红军为贫苦人打天下的初衷相接续,也是发人深省的。

还应该称道的是,作者并未将落后的山村描绘成完全封闭的世外飞地,那里仍然渗入有新时代的元素,甚至时尚色彩。贫困户们也拥有手机,顽固派石浩财财趁直播,拥有自己的粉丝,曾数次借此挑起事端,这些写照带来了小说别样的现实感,增添了作品的新鲜趣味。当然,扶贫干部们也借助网络渠道开拓了新的业务,争取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小说中有一节写农民朱雪飞、许秀珍等人不愿讲理,胡搅蛮缠时,金彩凤终于忍无可忍,声色俱厉地予以训斥,被石浩财当场录像传到网上,引起舆情,造成干部们的紧张。但小说接着写道,绝大多数网民竟一致点赞了金彩凤,教育了朱雪飞、许秀珍等人,隔空帮助促进了扶贫工作。可见,作者完全熟悉当下农村,能够超越传统内容,刷新乡土文学的面貌。

主题创作也是一场难得的竞赛,较量着众多作家的创作实力。温燕霞的表现,无疑是很突出的,多少有些出人意表,也使人们对她的创作前途怀有期待。

■第一感受

给尘世里的烦劳者以抚慰

——读范军《桂子山语丝》 □王先霁

我一向喜欢看记叙文坛和学林旧闻轶事的随笔。郑逸梅老先生的《书报话旧》《文苑花絮》和《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等都曾反复翻阅,蒋星煜先生的《文坛艺林备忘录》甚至买了两本——初版本和增订本。在啃读经典的间歇中读这些书的重要动力是享受阅读快感,但是,却绝不仅仅是消闲,它们给予读者的绝不仅仅是茶余酒后的谈资,更蕴含了为文、为学、为人的道理。同样,范军的《桂子山语丝》不限于给尘世里的烦劳者以抚慰,更能给困惑者以参照和启迪。

若干年来,范军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甚富,卓然成家,同时,他还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之中,这个集子里多数与后一方面有关。关于前一方面,我虽是外行,但也在出版单位做过几年学徒,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对于当代出版史、编辑史,也很愿意有所了解。关于后一方面,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已届64年,关于历年老师、领导、同学、学生,关于校园、校舍,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一鳞一爪,都能触动心底波澜。范军主编的《永远的怀念——忆陶军》《永远的怀念——忆介公》以及本书中的相关篇章,联系20世纪以来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宏观格局,细察华中师范大学这一个学校的前世今生,我们读来,对于教育上的兴衰得失及所以发生的缘由,当能别有所会。

范军在书里提到,章开沅先生上世纪50年代踏上历史研究之途,向前辈唐长孺教授请教,唐老师说:“从人物入手,知人论世,是不错的方法。”这本书谈华师校史、谈教育史和出版史,也是从人物入手,写到了晁华林、桂子山多位先贤。这既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也有利于提高它的学术史料价值。即使是在书中的许多细节里,我们也能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步伐是何等巨大,而对学术的忠贞、严谨的风范又该如何传承。举例来说,上世纪5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开启“汉译世界名著”这一宏伟的出版工程,其中选目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此书分上下两册,中译文加起来不过20多万字,却分别约请两位大家翻译,宗白华译上卷,韦卓民译下卷,导论是一个整体,前半宗译,后半韦译。我们揣想,这是因为,上卷是西方美学史的重要经典,请美学家宗白华译;下卷

讲目的论,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论述构成完整的体系,请哲学史家韦卓民译。韦先生是国内研究康德的专家,此前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释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他应约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已经完稿,是翻译《判断力批判》下卷的理想人选,两位译者都是当时最佳的搭配。宗先生1963年9月写的译后记说,下卷“现由韦卓民同志译出”,韦先生1963年4月写的译后记也说,另外的部分是“由宗白华同志译出”,异地同时在进行这一译事,上下卷分别在1964年年初和年末问世,以合作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环境尚属封闭,韦先生说及寻找康德原文的困难,参考西方各种文字译本不易,至于国外康德研究的最新进展更难以及时了解。因有出版社的精心安排,学者的合作,克服困难,给读者打开了解世界文明的一个窗口。这是当代学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应有当下学术翻译和出版工作可以汲取与借鉴的。

本书还有不少议论文字,特别是针对学术界利弊而发的锋芒的意见,在网上推出时就引起热烈反响,比如,“四唯”“五唯”如果只破不立危害更大》《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和大多数数临时偶发的文章不同,作者在这些文章里不是置身事外,用一些看似激进的情绪化的语言表达对于某些乱象的反感,而是努力做出理性分析,努力寻找可以实际操作的办法。集子里的文章保持了原状,一些文章后面附上网友的评论,增加了网络现场感,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此是否可以设想增添另一种可能的可能性?范军是研究新闻传播的,当今传播的途径、方式正在巨变之中。学者用网文发表的言论,之后转到传统的书籍形式,可以或者应该有些什么变化,如何起到沉淀、提炼、升华,或者也是可以探讨的。一方面,善用网络渠道,大有利于千百年来学术经典、文学经典的更加广泛的流传,另一方面,优秀的网络文学经过筛选、修订,深化在纸质形态上进入文化的库藏。两个方向工作的交织,促进我们的学术文化大幅度的普及和跨度的提高。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已经多少包含这样的意思了。